

第一部分
耶稣会传教士严嘉乐
从中国寄回祖国的信
(1716—1727)



约瑟夫·符拉什吉尔收集，
并从拉丁文和德文译为捷克文
编写前言和注释

约瑟夫·科尔马什为第二版
作专业校订和补充

1935 年捷文版前言（摘录）

当圣徒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¹在日本传播基督教时，他发现日本人十分尊崇中国文化，因而他着手筹划一个意义深远的计划，首先争取中国信奉基督教，然后通过中国的影响来争取东南亚其他国家。但正当他准备进入中国时，却在离澳门不远的中国海岛上川岛上去世了。他的教友们为此继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到1583年利玛窦(1552—1610)才第一次获得了在中国长期居留的许可。历史表明，他和他伟大的后继者们——汤若望(1592—1666)、南怀仁(1623—1688)等462名耶稣会士²以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地图制图法以及其他实用技术学科方面的精湛知识和技艺，在中国建立了多么巨大的功绩。这样他们才接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并博得了皇帝的青睐。在这类学术活动的影响下基督教开始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

大约在1630年以前，只有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在这以后其他各教派的传教士也开始在那里传教。耶稣会士由于受利玛窦的影响立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的文化氛围（例如尊崇孔子，孝敬先辈），而其他较晚来华的传教士对待这种适应方法的态度或多或少都是否定的。这就导致了近百年关于所谓中国礼仪的讨论和争执。这场争论最终以本笃十四世教皇在1742年7月11日颁发《自上主圣意》谕，禁止中国礼仪而告结束。关于这一

激动人心的时代的详尽资料由路德维克·帕斯托尔（Ludwig Pastor）在其作品《中世纪末期历届教皇传记》（弗莱布尔格，1891—1933）的第 15 和 16 卷中收录，其中关于传教活动的部分是在耶稣会士阿洛伊斯·克内勒尔协助下出版的。

对那个时代的这一争论客观冷静的结论应该是：“基督教的传播并没有受中国礼仪之争的阻碍而停止；今天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比本笃十四世教皇在位时增多了十倍。当然，原来想首先争取上层，然后取得全中国的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知识阶层的人归依基督教在中国只是少有的事例，他们往往是到生命垂危的时刻才接受洗礼。不过，对这一计划在本笃十四世教皇在位时遭到失败也不必惋惜不已，因为即使没有这位教皇的圣谕，再过 50 年之后的革命引起的天下大乱导致耶稣会的废除及其活动的停止，这一计划也必然会消亡。教皇禁止中国礼仪只不过是传教活动指出了另一个方向，并没有使之最终蒙受损失。”³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也传到了欧洲，在那个时代的捷克教会档案中也能发现其痕迹，而严嘉乐等 8 名来到中国的老捷克教省的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也是属于这一时代的。除严嘉乐之外，其余 7 人是：西里西亚法尔肯堡的魏继晋（1706—1771, 1738—1771 在中国）卡登的祁维材（1588—1642, 1620—1642 在中国）、米蒙（另有人称为尼萨）的石可蚤（1667—1711, 1707—1711 在中国）、卡洛维发利附近的尼德克镇（另有人称为因德日赫赫拉德茨市）的艾启蒙（1708—1780 画家, 1745—1780 在中国）、瑞士祖格市的俗家信徒林济各（捷克教省成员, 1658—1740, 1707—1740 在中国, 钟表专家）、西里西亚弗罗茨瓦夫市的阳秉义（1670—1716, 1710—1716 在中国）和比利纳市的鲁仲贤（1708—1759, 1741—1759 在中国，是接替严嘉乐担任宫廷乐师之职的）。这几个人中至少魏继晋、阳秉义和鲁仲贤是值得专题研究的。他们（除严嘉乐外）都是德意志人。⁴

严嘉乐 1678 年 12 月 24 日生于摩拉维亚的伊姆拉莫夫村（距波利奇卡不远）。1678—1680 年间伊姆拉莫夫村的宗教事务由两名耶

稣会士掌管。严嘉乐在布尔诺上了六年中学之后，于 1694 年 10 月 9 日参加了耶稣会。他在该会见习两年之后，到奥洛莫乌茨大学学了三年哲学，然后在该地高中任教四年。此后他又到布拉格大学听神学课四年。1706 年被任命为教士。1708—1709 年在伊钦市学了所谓三级研究班之后，他于 1709 年秋被派往弗罗茨瓦夫市担任中学五年级诗学教师，一年以后（1710 年）又到奥洛莫乌茨大学任希伯来文教授。同时他还是宗教节日传道的捷克族传道士和奥洛莫乌茨周围农民广泛参加的、欣欣向荣的圣徒伊吉多尔农人协会的领导人。1711—1712 年他在该市大学教数学，兼任大学中的传道士和训导处主任。1712 年获得哲学博士衔，同年发四绝誓愿。1713 年继续担任大学中的传道士和数学教授。1714—1715 年他在布尔诺任宗教节日时的捷克族传道士和他过去的老师、曾在布拉格和马德里任数学教授的雅库布·克雷萨（Jakub Kresa）的助手，协助后者将其数学文稿整理出版。这次调动工作使他能四年久病之后得到休息。

但是，如同当时其他的青年耶稣会士一样，他渴望着去海外传教。有的人为此向耶稣会总会长恳求达十次之多，等待十年以上，但仍未能如愿。而严嘉乐 1714 年秋天报名，到同年 10 月份就与巴伐利亚人戴进贤（1680—1746）和葡萄牙人徐懋德（1690—1743）一起被选派去中国。除了能满足对派出当传教士的人共同的学术上和道德品质上的要求之外，他还具有精通数学和能当乐师两项优势，这就是他被迅速选中派往中国的理由，在那儿传教的耶稣会士正好需要具有这几项能力。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的身份当选的。

1715 年夏他从布尔诺去布拉格，在那里他给耶稣会总会长坦布林尼写了感谢信（本书第 1 号信）。他在巴伐利亚与戴进贤见面，然后（不知是经过奥斯坦德还是热那亚）一起去里斯本，与他们的第三位同行者会合。他们于 1716 年 3 月 13 日从里斯本动身，绕过非洲前往中国。途中没有停留，一直航行五个半月之后抵达了目的地。到达自己盼望已久的国土之后，他即于 1716 年 10 月 24 日寄往祖国

第一封挺有意思的信，收信人是他的朋友、布尔诺的修会见习部主持尤利乌斯·兹维克尔。这封信（本书第 2 号信）到 1718 年 3 月才寄到布尔诺。他为何将信寄给教会见习部呢？除了他在那里有自己的朋友之外还有一个理由：见习教士最容易腾出时间来抄写这类有意思的信件。严嘉乐希望他的信至少抄写 3 份，分别送给布拉格、奥洛莫乌茨和罗马的教友。这样，在他刚开展工作时，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当时抄写类似的信件是常见的做法，而且今天对我们也挺有利，因为那个时代传教士的书信多半只保留了抄件，而原件已大量散失。

在这封信里他先是简短地告知他已安抵中国，而且在那时来看行程是非常之短。随后他说，他已开始学习汉语，汉语的语音对捷克人来说是何等容易；他还说取了一个什么样的中文名字。对这次旅途他只简略叙述了一下，详情希参见晚些时候他寄回的详细的航海日记。阳秉义不久前（1716 年 9 月 8 日）去世的消息使他十分悲痛，他还一直盼望着与这位自己过去的老师会面呢。他在信中还说，他正在注意当时中国的传教活动中的一些有趣的现象。他向祖国的许多友人亲切问候，并要求布尔诺的见习教士们为他祈祷，祝他能顺利完成传教任务。

这封信以及本书第一部分中收录的所有严嘉乐寄往祖国的信件（只有一件例外），其收信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耶稣会士尤利乌斯·兹维克尔。此人 1667 年 12 月 15 日生于莫斯特市，1685 年加入耶稣会。在修会中先后担任人文科学、数学、希伯来文、哲学和神学教授。晚些时候，在严嘉乐离开布尔诺去海外传教时期，他出任耶稣会见习部主持（1714—1718），后担任尼萨市的教士住院主管（1718—1721），以后又先后任弗罗茨瓦夫 1721—1724 和布拉格的克雷门提努姆住院的主管（1724—1725）及教省会长（1725—1729）。1738 年 6 月 12 日在布拉格逝世。

上文提及的严嘉乐的航海日记（本书第 3 号信）大概还是他在广州时整理并寄出的。在日记中他表现出对各种自然现象具有敏

锐的观察能力。

1717年新年之后，严嘉乐到达了他此后定居的工作地点——北京，只有在进行学术考察或由于保健的需要时才短期离开。

他从广州到北京的旅途见闻（有几段路还是坐的轿子），对中国首都的初步印象，尤其是礼仪十分繁复的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的召见，严嘉乐在他1717年3月19日的信（本书第4号信）中作了描述。他随信附寄北京平面图一张，这是他严格遵照测绘规则绘制的，正如同他当年在修会供职时绘制的布拉格平面图一样（他在1731年9月23日写给什杰潘·苏西埃的信中提及此平面图；见本书第11号信）。

1719年他寄了一封信给捷克一位情况不详的耶稣会士托马什·马透什（本书第5号信）。此信的内容只摘要刊登在法国历史学家拉克罗吉乌斯（Lacrozius, 1661—1739）的通信集中。⁵ 信中提及康熙皇帝还活着，他相信上帝，容许农奴们自由归依基督教。可是，由于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主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很慢。中国人尊崇孔子，只是把他视为一位目光敏锐的哲学家，而不是对他怀着宗教的崇拜。汉语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之难。但自从耶稣会士编出了汉语语法书之后，新来的欧洲人学汉语困难就要少得多了。⁶

严嘉乐的下一封信（本书第6号信）是1723年10月14日从华南的南昌市寄的，那段时间他大约有一年不在北京。收信人还是他的老友尤利乌斯·兹维克尔，他那时的职务是布拉格克雷门提努姆住院的主管。他在信中说，康熙皇帝已逝世。康熙年间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要比前几任皇帝在位时好得多，尤其是1692年宣布基督教完全有自由在中国传播之后。他的继承人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与他相反，不喜欢基督教，开始对基督徒进行残酷迫害。

严嘉乐寄往祖国的第6封信（本书第7号信）是1725年11月20日写的，收信人又是兹维克尔。信的内容是一份“年度报告”，即葡萄牙耶稣会北京住院以及该修会整个中国代教省1725年的活动报告。1722年康熙皇帝逝世。他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他之所以未能

成为基督徒只是因为他实行多妻制。他死后，他的四子胤禛继位，⁷这位皇帝在位时大肆迫害基督教，将所有的欧洲传教士都放逐到广州，只有一些具有专业知识，对宫廷有用的人才准许留在北京。

本书收录的最后一封严嘉乐寄往祖国的信（第 8 号信）是他 1727 年 11 月 28 日写给兹维克尔的，当时后者已升任布拉格教省会长。这封信基本上又是至 1727 年为止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报告。信中详尽地描述了信奉基督教的苏努家族日益受到迫害、忍受无忍苦难的情况。葡萄牙公使出面为传教士说情，结果无济于事。但在另一方面，中俄边境纠纷经俄国公使出面、耶稣会士巴多明作为译员加以协助，竟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上述七封信（第 2~8 号）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严嘉乐与祖国联系的全部书信。但愿今后能在档案中发现更多的材料。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Alois Jirásek）在《黑暗时代》一书中通过小说中一位主人公之口对耶稣会士提出了指责，说他们借助严嘉乐以自夸。不过，耶稣会士肯定没有在书刊上夸耀过自己。在 16 世纪末耶稣会士巴尔特扎尔·何斯通斯基（Bartazar Hostoušský，1534—1600）写的《印度来信》之后（见《基督教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史》，1581 年里托米什尔出版）在 1630 年耶稣会士伊瑞·普拉希—佩卢斯（Jiří Plachý - Ferus，1585/1589—1659）写的《转而信仰基督教的世界各国地图或古老可信的编年史》之后（此书除概述在中国开始传教的情况外，还是描写日本和在日本传教情况的第一本捷克文的书）在埃曼努埃尔·德·博伊（Emmanuel de Boy，1639—1700）用拉丁文写的关于捷克教省耶稣会两名殉道者的传记之后，⁸18 世纪中我国从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我国在海外传教士的书，不论是用捷克文、拉丁文还是用德文写的。

一直到著名的关于海外传教活动的文集（德文）《新世界信息》（见亨利·科尔迪埃著《中国图书馆》第 2 卷第 941—949 纵列）出版之后，我国的知识界人士才得知一些关于我国这些有信仰、有文化的开拓者在海外活动的情况。这一包含耶稣会传教士从世界各

国寄来的珍贵信件的文集是耶稣会士约瑟夫·什托克兰 (Josef Stöcklein, 1676—1733) 于 1726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在 1728—1758 年间在奥格斯堡、格拉茨和维也纳出版的 36 卷文集中, 什托克兰亲自编辑了 24 卷。他死之后, 他的教友卡尔·麦耶 (Karel Meyer, 1678—1742)、彼得·普罗伯斯特 (Petr Probst, 1699—1750)、弗朗吉舍克·克列尔 (František Keller, 1700—1762) 和弗朗吉舍克·克萨维尔·梭切尔 (František Xaver Socher, 1706—1781) 继续进行了这项工作。

什托克兰在编辑这部文集——它至今仍在那个时代传教史的重要文献——时, 是以比它略早一些的法文同类文集《耶稣会传教士关于海外传教活动的珍贵有教益的通信集》(所谓老版本共 34 卷; 后又出现了几次新版和译文; 参见 H. 科尔迪埃的这一文集, 第 2 卷第 926—941 纵行和 949—957 纵行) 为范本的。这一范本是 1703—1776 年间在巴黎由耶稣会士查理·勒·戈比安 (Charles le Gobien, 1653—1708)、然一巴普提斯特·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路易·帕土伊勒 (Louis Patouillet, 1699—1779) 和 P. 马雷沙尔 (Maréchal, 1749—1776) 陆续编辑出版的。从这本书中选用的信件什托克兰将之由法文译成德文; 他还从中欧各教省会长处找到过用拉丁文写的传教士信件的原件或抄件。

在本书第 2、3 号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什托克兰的编选方法的痕迹。⁹ 他常将两三封、甚至十几封信的内容摘要归拢在一起, 而把他认为不太有意思的东西略去, 例如各种问候语或向别人转达的话语等等。这么做当然会使原信中亲切热情的笔调大为减色, 各地有特点的趣事也被删减不少。例如, 在本书第 2 号信开头关于顺利到达中国的话之后, 什托克兰完全删去了原信中关于汉语的一段极为有趣的话——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捷克人评说汉语的话——以及严嘉乐写的“详细的航海日记以后再寄”的话, 将之改成为: “现将从里斯本到中国的详尽的航海日记送上”, 在这句话以后, 他就将本书第 3 号信的内容——详尽的航海日记——塞进了第 2 号信里; 而本

书根据布尔诺国立地区档案馆保存的原件逐字逐句翻译的第 2 号信中，对这段航行只作了十分简略的叙述。在信的末尾，我们将第 2 号信和第 3 号信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什托克兰如惯常一样删去了对一些个人问候的话，尤其是家人之间的问候。

什托克兰对严嘉乐的信极为重视，认为它们内容充实，言简意赅而且拉丁文也颇精练。因此，其他的几封信（见本书第 4、6、7、8 号信）他几乎未加删改，全文刊登，只对某些非实质性的、有些难以处理的小地方作了删节。

什托克兰在他的《世界信息》第 7 部分（第 2 卷）的前言中首先明确指出，严嘉乐在航海日记中描述了在海上观察到的不寻常的自然现象，而别人写航海日记则往往是不厌其烦地描写航船上发生的一些趣事。严嘉乐却只字未提这一类的事。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他除了描述不寻常的现象之外，还准确记载了航船何时、何地跨过了赤道、回归线等等。

在《世界信息》第 19 部分（第 3 卷）的第 413 号信件中刊登了严嘉乐 1727 年 11 月 28 日写给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见本书第 8 号信）。什托克兰在前言中对这封信作了如下中肯的评论（据我所知，他对任何别人写的信从未作过这样的评论）：

“对别人浪费笔墨加以描述的事，严嘉乐只是简略地写几句就完了。很可惜，后来他几乎就不再写信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通信未能用拉丁文原文发表。我认为，他的信要比所有其他传教士写的信更有价值。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宫廷发生的一切值得纪念的事件，并根据得到的消息记载了整个中华帝国发生的大事。可是，他的拉丁文再精练，他的日记写得再杰出、内容再充实而简洁，今后对我们还能有什么帮助呢？因为他发誓说：除非有迫切的理由（这是他的原话），他以后不再往欧洲寄送消息了，而是让别人来接替他。如果蛀虫、耗子也懂人事，我真希望他们‘口下留情’，不要去啃咬严嘉乐留下的珍贵文稿，因为中国用木材制造的纸张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虫蛀掉的。还有，严嘉乐寄到欧洲的信比其他人的

信都要快，这也许是由于他是通过俄罗斯这条捷径将信寄往捷克的。”

《世界信息》中收录的严嘉乐的信的编号是 155、156（第 7 部分）、203（第 8 部分）、295（第 12 部分）和 413（第 19 部分）。

什托克兰编辑出版的书在 19 世纪初叶由捷克的第一位传教史学家、著名的斯特拉霍夫的普雷蒙特利会士博胡米尔·杨·德拉巴契(Bohumír Jan Dlabač, 1758—1820) 加以利用，收入他编辑的文集《捷克人、摩拉维亚人和西里西亚人从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寄回的有纪念意义的信件》中。编这一文集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于 1813 年完成。同年他当选为捷克皇家科学协会主席，通过这一协会他提出将此文集付印。但那时的外部环境是对出版捷文书刊不利的，因而这一文集久久未能问世。直到他死后，协会根据其会员、神学教授麦克斯米兰·弗朗吉舍克·米劳埃尔(Maximilian František Millauer, 1784—1840) 的建议，将书稿送给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市的约瑟夫·利博斯拉夫·齐格列尔(Josef Liboslav Ziegler, 1782—1846) 请他将文稿在《益世娱人杂录》杂志上发表。此杂志在 1821—1822 年陆续将之发表。它还发表了文稿最有价值的序言部分，即按字母排列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传记，这是布尔诺的地区秘书、摩拉维亚的文学史家杨·彼得·策隆尼(Jan Petr Cerroni, 1753—1826) 根据修会的官方资料提供的，这些原始资料现今已大部散失。这正是这些材料宝贵之处，至少对耶稣教会存在的那一时期的资料来说是如此。德拉巴契对较晚时期提供的资料则已不大准确，因为大多是根据偶然得到的个人信息编写的。

德拉巴契在他的文集中共收录了 50 篇捷克传教士的信件，其中也包括严嘉乐的信。有几篇是根据保存在布拉格斯特拉霍夫图书馆的拉丁文原件翻译的，但主要是根据什托克兰的《世界信息》中的德文信件翻译的。这部分文选（这是德拉巴契的书的核心）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同样，齐格列尔 1822 年在《益世娱人杂录》杂志上、1824 年在《捷克光荣》杂志和《美景》杂志上、1831—1832 年在《青年

之友》杂志上发表的 1682—1686 年间写的 14 封信也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也就是说，德拉巴契收集的文稿中在报刊上发表的不足三分之一。齐格列尔担任赫鲁吉姆教长之后，转而从事实的教育工作，于 1846 年逝世。他收集的文稿中未发表的部分，包括严嘉乐信件的译文，均已散失。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感激德拉巴契提供了严嘉乐生平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本书中也广泛加以引用；而本书是世界上以捷克文形式发表严嘉乐信件的第一本书。……

耶稣会士

约瑟夫·符拉什吉尔

1935 年 10 月 1 日于布拉格

1. 严嘉乐从布拉格寄给罗马米开朗琪罗·坦布林尼的信 (1715 年 7 月 10 日)

无比尊贵的神父，
总会长神父¹⁰：

当我常常想起，尊贵的神父您如此乐意地满足了我的愿望，我就感到，虽然我还没有上船，我的整个身心都已航行在上帝的无限智慧的海洋中，我充满了对上帝坚定的信仰；除了担心我自己不知感恩和学识浅薄之外，我对一切都无所畏惧。因为我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珍视的工具，这种工具越是谦恭就越能有效地宣扬上帝的荣耀。我现在正怀着平静的心情准备远航。一方面我并没有要求去开展需要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去做的活动，如果说我有过错，也许就是我居然心安理得地自告奋勇；另一方面，我诚挚地恳求全能的上帝，如果他发现有何不妥，就可以任何方式制止这次远航。

尊贵的神父，对您给我如此珍贵的恩宠，我应该怎样来报答您呢？我将跪倒在您的面前，像您最小的儿子那样，恭顺地吻您的脚，怀着热爱吻您的手；我将为您做九次弥撒，还将做在上帝恩宠之下能够做的其他好事。

当我跪着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恭顺地请求您，尊贵的神父，为我做父亲般的祝福。我永远，是，尊贵的神父，您的最后的一个儿子，

是耶稣基督最卑贱的奴仆。

卡尔·斯拉维切克*
1715 年 7 月 10 日于布拉格

* 卡尔·斯拉维切克 (Karel Slaviček) 是严嘉乐捷文原名，他到中国后才取名严嘉乐。——译注

2. 严嘉乐从广州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兹维克尔的信 (1716 年 10 月 24 日)

尊贵的见习部主持神父¹¹：

我相信，您在国内企盼我来信的心情同我赶紧写这封信的心情是一样的急切。赞美上帝，他让我很快抵达了中国，并且及时给了我机会来将我的消息早日传送给您。因为有几艘法国船正准备从广州返航，直驶卡的斯。在它们之后，还有英国船在 11 月底启航，而我们的葡萄牙船将在澳门停泊一整年。

我不能像原来打算的那样给您寄上航海日记，因为我的笔不由自主地要先写写我正在从基础学起的汉语（我宁愿叫它为复杂难懂的巴比伦语），汉语的字 的发音有 364 个 例如 Yan Jia-le*、严嘉乐，我的中文名字）就有三个音，但每个音的意义却随着（汉字）许许多多不同的写法而各异。例如：发 ji 这个音的汉字就有 140 多个 每个汉字含义都不同；发 qi（与意大利文 ci 相似）的汉字有 120 多个，发其他的音的汉字数目略少些¹²。正如欧洲的文字字母很少，而词却非常多一样，汉语的字音少，而能确定词义的汉字却很多。一音多义在书写时可由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得到限定。但在口语中各种重音和五声往往还不足以区别全部不同的词义，还必须靠聪明才智

* 本书捷克文原文用了捷克目前通用的汉语拼音法，汉译者将之改成了中国人熟悉的汉语拼音法。——译注

和实践经验来帮忙。如果这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好用写出（有时用手在空中比划）汉字的办法来解决了。

汉语的语音使世界各国的人都感到十分困难，惟独对捷克人或波兰人却几乎一点也不难。一位波兰的方济各会士编的汉语语法书证明了这一点¹³。而且在我弄到这本语法书之前，我亲身的经验和中国人的首肯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中国人发的音我很快都能听懂并且能模仿他们说的字句。但我并不是说捷语或波语包含了汉语的所有音素（因汉语中有许多喉音，也有许多完全像希伯来语的音），但是……¹请您想一想，要学会一万二千甚至更多的汉字以及它们的不同字调（字调变了词义也变），这是多么不简单呀！不过，有一个特点却使困难大为减少，这就是在表示某种职业或工具时汉语使用的组字法，与德语的组字法几乎完全一致，例如 Haus-Knecht（家奴，家仆）、Scher-Messer（刮刀）等等。当然除了对希腊人和德意志人之外，这种组字法也是十分古怪的。我想，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几句关于汉语的评介也许就够了。

现在我来简述一下我的这次行程。

1716年3月13日傍晚我们在里斯本登上了有30个舱位的“圣徒安娜号”船。这艘船虽然是中等大小，但它的速度却很少有船能与之相比。这是一艘法国船——这对我们来说是交了好运，因为耶稣会士能够不乘葡萄牙船而这么快就到达目的地，我们这是第一批、恐怕也是最后一批了。

3月14日下午一点钟，欧洲大陆上的城市都在地平线上消失了。在到达卡那利群岛之前与我们的船同行的还有14艘赴巴西的船和1艘赴安哥拉的船。除了视察员¹⁵和我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巴伐利亚的戴进贤¹⁶和另一位比我年长的神父，这些过去都曾经在海上航行过的人，在上船后的第一天夜里就尝到了大海的厉害，以至于我们的船舱马上变成了充满痛苦呻吟的病室，而我也有了—次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和表现对别人关爱的好机会。

4月15日夜、16日凌晨我们的船跨过了赤道，6月2日绕过了

好望角阴沉的山头。两次都平安无事：过赤道时凉风习习，缓解了炎炎酷暑；过好望角时波浪翻滚。我们离开葡萄牙之后看见的第一块陆地是苏门答腊岛——那是在 7 月 25 日。我们驶出马六甲海峡是 8 月 4 日夜。8 月 30 日凌晨我们到达了澳门。这样，就在圣徒罗莎日我们的旅途劳顿全部结束，这一旅程历时仅五个半月零一天半。如果乘船经过果阿来澳门，行程就要延长 11 个月。只有圣明的上帝保佑的人，才能这样飞快地到达目的地。¹⁷

这里的人去年就盼着我们这两位从中欧来的传教士了¹⁸，不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姓名。（耶稣会）总会长在 1714 年 12 月（也就是说在我 10 月份向他提出申请来华传教之后不久）的信中向他们作了这一承诺。在我们抵达澳门之后的第二天，教省的会长神父就写信告知广东总督。此后不久，在 9 月 7 日，总督就派了一名军官到澳门来做我们的向导。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我缝制了中国衣服，9 月 4 日替我剪了中式头发；而在同一时间里，死神正在满洲磨他的剪刀，要剪断尊贵的神父阳广文¹⁹（另有材料作阳秉义）的生命之线。

9 月 7 日，就是那位军官来到澳门接我的那一天，皇帝传旨将阳广文从满洲送到北京来。奉命陪他来的是他的好友马国贤²⁰。

9 月 8 日（那是圣母玛利亚诞辰）的下午，我们身穿中国服装在军官家演习中国礼仪——而在同一时间，具有卓越的学识、过着模范的修士生活而令众人敬爱叹服的阳广文神父接受了最后的基督教圣礼。在晚六时长眠，随上帝而去，他患的是久治不愈的痼疾。皇帝是在 7 月份才得知阳广文患病难愈的消息的，他对大臣们严词训斥。因此，这些担心自己身家性命的大臣们恳求我们千万别对皇帝讲阳广文去世的事，要讲就等到 10 月底皇帝回去以后。

亲爱的阳广文神父的逝世使所有的传教士感到由衷的悲痛，大家都说，他的去世使传教活动失去了不可多得的顶梁柱。可是，最为悲痛的确是我。我紧赶慢赶，想争取见他一面，结果却未能如愿。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竟是这么一个不祥的扫帚星，我的来和去